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日)冈田武彦著;吴光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
ISBN 7-5325-2694-1

I. 王… II. ①冈…②吴… III. ①王守仁(1742
~1528)-哲学-研究②新儒学-研究-明代
IV.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373 号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36,000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25-2694-1

B·308 定价:22.40元

中文版序

本书大约成稿于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倘要问我为何对明末儒学有兴趣,那么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其中有某种西洋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见解,而是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的一种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动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学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例如,我将自己的九州大学毕业论文题名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该文立足于西方存在论,解释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与西洋哲学相同的内容。当时还自我满足于这种看法。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未免犯了对西洋人侈谈中国人不识国宝的错误。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深刻反省。结果使我痛感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那也无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纯粹经验论和直观主义,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这种方法忘记了: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切至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真髓的。即便是今天依然如此。当今中国哲学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洋学风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还自

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崭新的”方法。然而,这和真正的“创新”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此,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从而促使我从外表浮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是心甘情愿去探索的。

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促使我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说来并非偶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中学和高中时代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我是为消闷解愁而读哲学书的,并对禅学产生兴趣,从而熬到了高中毕业。当时由于家境贫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念头。幸亏碰上了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他资助我离开了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大学学习。本来,我曾打算上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师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洋伦理哲学。但此愿未遂,我不得不进九大,当时心情,不免有些愤懑而又无奈。然而,也许出于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的楠本正继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人生的最大幸运。在整个大学时代,为从这位伟大的先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我如醉如痴、竭尽全力地学习。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经常立足于用西洋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也许是必然的。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其间,虽然也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但正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于坐禅。数年后,我又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在先生膝下聆听教诲。那时战争已经逼近,但我仍在先生家里读王白田的《朱子年

* 楠本正继(1896—1963),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文学博士。1926年至1960年间长期担任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著有《熊本实学思想研究》、《朱子学的发展》、《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研究》等书。——译者注

谱》，并记述先生的语录，可惜原稿在美军飞机空袭时丢失了。当时我发现，先生的学风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从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弃西洋哲学而致力于中国哲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亲追思其师长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人品的逸闻遗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的儒者，他遵藩命就学于江户（今东京）的昌平黉，其间读过来访的水户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学者）藤田东湖所著的《弘道馆记述义》，并为之倾倒，归藩后还出版了这部书。云平先生归隐家乡后，我的父亲曾在神官受过他的教诲，并在云平先生的长子任校长的小学里任职。父亲喜欢喝酒，沉默寡言，和气温厚，从不对人发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也常对我讲述内心修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对儒教怀有亲近感并热心于儒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师膝下学习，恩师培养、造就了我足以克服苦恼的信心和勇气。我之所以偏爱陆王心学，就因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也有深深的苦恼。所以，我以为即使读儒家的书，也是读语录和行状比读论说更能动人心弦。这大概是我痛感内在性研究重要性的内在缘由。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地处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把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西学流入东洋后都专门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整理东洋的哲学思想，这一功绩应予高度评价，今后也企望用这种方法作更精密的研究。然而考虑到东洋哲学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就不能不关心、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但这一点却正在逐渐被人遗忘。而且，在反思东洋哲学思想在现代及未来世界思想界的意义与价值时，今天也已到了对内在性研究比对象性研究更受重视的时机。这是我三十至四十岁时的切实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经激励自己的陆王心学为

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踪迹,而明末哲学思想之所以适应时代思潮这一问题,也就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对象。它使我懂得了应以极其亲切的体认之学为本,并深感静坐体认方法的必要性。

我在四十四五岁时,得到了恩师所赠的其祖父楠本端山的遗书*。拜读之后,深为体认之学的深潜缜密所震惊。因此,终于有了继承道统的自觉。恩师将其家学精神融会于学术研究中,从而树立了与众不同的优良学风,其成果可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一书中窥见一斑。端山先生专攻宋明儒学,并继承了日本山崎闇斋的朱子学,是幕末维新时期儒学家**。恩师的学风中就继承了其家学的传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比谁都更多地是在恩师膝下亲身感受其学风德望的熏陶。如今,具有这种学风的学者能有几人呢?

正因为我深感内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体认方法解释思想时,我与别的学者不同,是让思想家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的思想,我在其间只起辅助作用,或者说,我只是履行了助产妇的职责。当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体认方法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矛盾,有缺乏统一性之病。但我决不在作理论研究时踌躇不前,否则的话,“体认为本”思想的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决不允许陷入教条主义。故而当王阳明得知有人记录其

* 楠本端山(1828—1883),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新朱子学派的著名儒家。原名确藏,改名后觉,号巴山,一号端山。长崎人。与其弟楠本硕水(1832—1916)俱称名于世,时有“西海二程”之说,并形成楠门学派。有《楠本端山遗书》及《端山硕水二先生全集》传世。——译者注

** 山崎闇斋(1618—1682),德川幕府时期著名儒家,京都人。初名柯,幼入佛寺,归儒后改名嘉右卫门,字敬义,号闇斋。笃信程朱理学,创立了崎门学派。著述弘富,有《山崎先生全集》,《续山崎先生全集》传世。幕末维新,指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1603—1867)的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3)。——译者注

言论时曾说：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增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传习录·序》）

如前所述，《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因为是在三十年前写的，所以未免有些生硬，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读者能顾及我的上述立场。据我看，明末的思想处于儒教思想发展的顶峰，而且可以说是立足于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的。我热切期望读者能从本书理解这一点。

写作本书时，我以静坐体认为吾学之本。我想，经历三十多年以后，我的思想也相应地发展了。这里虽未涉及这一点，但我想指出的是：只要能运用“内在性研究”的方法，就不仅能掌握传统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将确信无疑地从中产生出能够匡救时弊的具有独创性的哲学。东洋的思想创新与西洋不同，它必定是从回归传统中得来的东西。这里虽然省略了理由之说明，但只要指出无论怎样的创新，其根基必定存在于传统之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能从事明末儒学的研究，是因为恩师家中收藏着（楠本）端山本人及其祖孙三代书香门第所搜集到的宋明理学资料，加上恩师自己购入的新资料，以及九州大学置备的重要资料，并赐予了我阅读学习的好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动乱之后已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从而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同时，国际关系日趋密切，也提供了阅览外国资料的机会。加上新资料不断出版，使得明末儒学的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对此，我深感振奋。今后，倘能根据新资料加以研究，从而使这个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精密的话，我将会非常欣喜的。

本书的中文翻译及其出版，承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凤

贤先生的关心,以及同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光先生、所员钱明先生和杭州大学哲学系屠承先先生的努力工作,又蒙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先生的厚意支持,使之顺遂圆满。在此,我一一表示深情的谢意。

冈田武彦

1987年11月于福冈

前 言

本书以明末儒学为中心，对王阳明及其门人以及与阳明同时代的儒家湛甘泉的思想作了论述。“明代的儒学思想”，本是距今十几年前，著者的恩师、已故楠本正继博士接受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研究基金资助而从事宋明思想研究时，作为研究员之一的笔者整理出来的研究成果。恩师的研究成果，在昭和三十七年（1962）以《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为题出版，而有关“明末儒学思想”这部分则割爱了。所以，本书也可以说是恩师著作的续篇。

近年在国内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中，对于明末思想之研究愈益关注。数年前，著者也曾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聘，参加明代思想的研讨，尔后，又有幸出席了在伊利诺斯大学举行而有世界各地学者参加的明代思想研讨会。有关明末思想的资料也在近年陆续出版。何况，楠本家原本出自幕末维新时代著名的朱子学者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之门，所以，恩师家里收藏了丰富的有关宋明儒学的珍贵资料，九州大学的研究室也搜集了不少资料。这对于著者来说非常幸运，但对明末儒学而言，以往毕竟缺乏系统而充分的研究。这是因为，第一，大概资料不足；第二，不只是朱子学和陆王学，而且还有其他儒家的思想以及佛教、道教思想微妙交错，不易把握其精神实质。这也许是明末儒学研究不够充分的主要原

因吧！

明末的儒学思想虽因其奇特殊异而引人注目，而且人们对近代有革新倾向的阳明学亚流也还比较关心和理解，但对于明末其他流派及其思想，则令人遗憾地鲜为人知。实际上，人们如果从明末思想中，对产生于明末动乱社会并建立在深切体验基础上的宋明性学或心学的秘蕴进行开发，就可以挖掘出能为近世儒学思想史增添光彩的仅次于程朱陆王的大儒。况且，他们的思想曾被日本幕末维新的朱王学者所摄取。这些日本学者依靠它从事于为日本儒学所未见的真切的体认之学，而给日本的近世思想打上了鲜明的印记。至于日本的儒学思想史，历来就有一种不太顾及这些幕末维新时期的朱王学者思想的倾向。其原因之一，或许是对明末朱王学者的思想不太理解的缘故吧！而且，虽然一般都知道日本古学派思想和明末批判派、复古派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由于对明末思想的理解不充分，因此在对以往的古学派的研究中，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本书的大部分因是著者年轻时所作的研究，未免有些生硬，但基于上述原因，著者仍然大胆付梓。在最近出版的明末资料中有著者未见的东西，这也只好留待日后去弥补本书的不足了。再者，在论述明末思想的时候，当然也应该论及明代遗老的思想，但这些在本书中也不能不省略了。读者对于本书的个别论旨也许会有困惑之感，这不言而喻是著者的浅学菲才所致。对此，著者虽已意识到，但毕竟是要恳请读者谅解的。那是因为，著者虽然是与思想家“疑义相与析”的，但解决思想上课题的过程却不能完全照原样形诸笔端。至于说到深层的研究，著者遵循这样的方法：一方面从历史的立场出发，同时相信并运用能够超越历史立场的任何方法。

本书若没有对儒学有着深刻认识和感情的明德出版社小林日出夫氏的理解和援助，是难以出版的。而且，本书出版时，在校对

方面有劳九州大学助教授佐藤仁氏及福田殖、中川嘉彦、吉田公平三氏。为此,谨向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昭和四十五年(1970)七月一日

著者于福冈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序论	1
第一节 明代的文化与思想	1
第二节 明学的源流(朱陆异同源流考)	17
第二章 王阳明与湛甘泉	33
第一节 总论	33
第二节 王阳明	35
第三节 湛甘泉	70
第三章 王门三派	103
第一节 总论	103
第二节 现成派(左派)	105
王龙溪·王心斋	105
第三节 归寂派(右派)	117
聂双江·罗念庵	117
第四节 修证派(正统派)	143
邹东廓·欧阳南野	143
第四章 现成派系统	160
第一节 总论	160

2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第二节	罗近溪	168
第三节	周海门	181
第四节	耿天台	193
第五节	何心隐	204
第六节	李卓吾	210
第五章	归寂派系统	226
第一节	总论	226
第二节	王塘南	229
第六章	修证派系统	239
第一节	总论	239
第二节	李见罗	244
第七章	湛门派系统	259
第一节	总论	259
第二节	许敬庵	262
第三节	冯少墟	271
第八章	批判派与复古派	283
第一节	总论	283
第二节	冯贞白	288
第三节	陈清澜	309
第四节	吴苏原	324
第五节	郝楚望	336
第九章	东林学和刘戡山	356
第一节	总论	356
第二节	东林学	366
	顾泾阳·高景逸	366
第三节	刘戡山	393
译后记		416

第一章 序 论

第一节 明代的文化与思想

—

一言以蔽之,由二元论到一元论、由理性主义到抒情主义,从思想史看就是从宋代到明代的展开。在明代,以情为中心比以理为中心更突出的理情一致主义、兴趣比技巧更受重视的感兴主义、性情自然比理智规范更受尊重的自然主义、主观比客观更受强调的主观主义、提倡反传统并高喊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主义,都相当盛行,甚至出现了近代革新思想的萌芽。

在儒学方面,理学(性学)衰落而心学繁荣,结果导致了所谓经学、训诂之学的衰微,出现了即使解释经典也喜欢依照主观体认而提出独创见解的风潮。

这不仅是对儒学,而且对道教佛教也一样,因为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论相当兴盛。此外,在平民中间也有所谓“劝善惩恶”的民众道德之书(善书)的流行。这是该时代的特异现象。

在文学方面,排斥模拟而重视性灵;在艺术方面,感兴比技巧更受尊重,乃至可以看到以富于个性的新奇的自由表现为宗旨的

文人画书法等艺术的繁荣。仅仅作为异例,基督教的传入,使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影响。当时虽对基督教有各种批判和反对意见,但一方面出现了像徐光启那样力求调和上帝观念与传统天命思想并折中两者的倾向,另一方面则随着基督教传入而输入了西方科学,于是产生了一股重技术、尊实用的风潮。不过我想,这恐怕是以明初以来成为官学的朱子学为背景的,因为在朱子学结构中,已经具备了接受这类科学的基础。

宋代的精神文化,在内在的知思方面,应该说是有其特色的。这只要看一看在画山水时多留空间并带着神韵的马远、夏珪之画,以及用静穆而严正的眼光凝神幽远的彼方的徽宗皇帝的禽鸟画,就容易理解了。这类绘画,可以说是比表现情趣更加尝试着表现自己的主观和哲理性的东西。在这里,还有重视气韵的缘故。所以,即使在画很小的花卉时,也不流于装饰。可以说,由此才表现了灵活的宇宙大生命和气韵的生动性。

实质上,这无非是要抛弃外表的华美,即多彩而复杂的装饰之美,而表现内在的心灵深处。这种倾向,只要看一下宋代的白磁、青磁、青白磁等也就容易察知了^①。

至于明代,宋代内在的、知思的倾向变得淡薄,而逐渐转移到外在的、抒情的东西。即使从磁器来看,在明磁中没有如同在宋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理智的、严肃的造形追求,明磁的姿态是自然的,看不到做作的痕迹。此外,还把构思转向那种浓穆丰润的蓝釉磁器和赤釉磁器之类富有情趣和装饰性的东西上,而且其笔法畅达,表现手法自由而飘逸奔放。若将明代万历的赤磁、天启的蓝磁和宋代的白磁、青磁、青白磁加以比较的话,两者的不同是一目了然的。

在宋明两代的精神文化之间,为什么会产生上述那样的差异呢?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承担者的阶级层次的不同,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原来,宋代的精神文化是适应官僚知识阶级的情趣的,而明代的精神文化则是适应平民阶级的情趣的。从宋末到元初,因为知识阶层大多下野而栖居于草莽之间,因此,被官僚知识阶级发展、保存下来的精神文化,也渐渐发生了适应平民阶级趣向的变化。这又成为促进庶民文化勃兴的一个原因。而且,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北方的蛮族,因此,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前所未见的庶民文化在这个时代兴起了。

继元灭亡而再生的明朝虽然是汉族朝廷,但庶民文化却依然繁荣。明中叶以后,和我国的江户时代一样,与海外贸易相结合的庶民的经济生活不断提高,终于开出了绚丽的庶民文化之花。其结果是,适应官僚知识阶级的理性的精神文化衰颓,而适应平民阶级的抒情的精神文化隆盛了。

宋代的精神文化,如前所述,是理性的,其中充满着静深严肃的风气。实质上,这是因为宋人具有在人的生命中树立高远理想的强烈愿望,因此坚持了纯粹性和客观性。以朱子学为枢轴的所谓宋学,就是从这种风潮中发生、成长的。朱子学以禅学,特别是以理事无碍法界说的《华严经》和老庄道教为媒介,扬弃了传统儒教的人道和人伦。例如,朱子倡导所谓理学(性学)而提出具有二元论思维结构的理气论和性气论之说,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然而一到明代,就可发现宋人所追求的理想主义的、乃至客观主义的东西,因为固定、抽象而变得空虚。所以明人认为,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不但与生生不息的人类的生命相游离,而且与人类在自然性情中追求充满生机的生命的愿望相背离,因此,明人去追求那情感丰富的、生意盎然的感情的东西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以王学(阳明学)为轴心的明学,就在这样的风潮中发生、成长起来,这从王阳明倡导所谓的心学、提倡具有一元论思维结构的心性论和理心论可以窥见其底蕴。